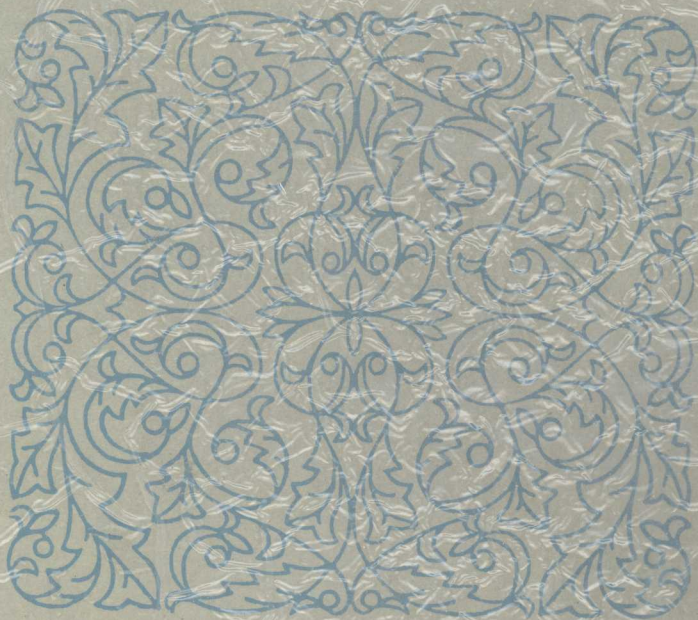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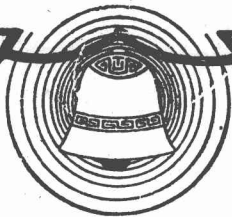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大學圖書館  
科學思想與時代叢刊第二種  
現代思潮新論

全一册 定價國幣四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張其昀等

發行人 吳秉常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2264)

當代中國哲學

近代唯心論簡釋

現代思潮新論

賀麟著

賀麟著

張其昀等著

# 民國叢書

第三編

· 5 ·

哲學·宗教類

4090

吳國叢書

第一卷

目錄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賀  
麟著

當代中國哲學

當今中國藍圖

買

書

本書據勝利出版公司1945年版影印

## 序言

賀麟著

在中國，特別在八年多抗戰時期的中國，不僅是物質方面的交通不便，即精神方面的交通似乎也很不方便。即以中國哲學界而論，有的人著成了書，但迄沒有印行。有的人雖有了書出版，但或因淪陷在上海或香港，無法運來內地，或因在這一城市出版的書刊，銷行只限於這一城市附近一帶，無法銷行到別的城市。又如中國哲學會在抗戰前兩三年內，每年舉行年會一次，宣讀論文，討論問題，頗有自由交換意見切磋辯難的機會，而在八年來的抗戰期中，除了二十八年的夏天，在昆明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小的年會外，迄今未能舉行第二次年會。總之我們很難有機會彼此互相關道同時代的別的人在哲學方面的努力和成就。

我很欣幸在中國哲學界這樣隔閡的情況下，我個人比較多有機會得讀中國現時哲學上的許多著作，並得與中國哲學界許多人士晤談領教。因此出版家要請我寫一冊「當代中國哲學」我便欣然應允了。本冊裏所提到幾十位在中國哲學上有貢獻的人，除開極少數業已死去的，如康有為、譚嗣同、章太炎等，其餘的人，或是我所親炙的前輩，或是在北平或昆明的哲學討論會中，我聽過他們的演講，與他們討論辯難過哲學問題的同道，或是與我見過面通過信討論過哲學的朋友。篇中對於他們的哲學思想的敘述，固然表示我對於他們的著作之客觀地同情地了解，同時亦即

表示我在學問思想上曾受過他們的益處，藉這裏的篇幅略表我對他們的感謝和敬佩之忱。雖然篇中有幾處，我曾對於有幾位先生的思想，約略加了幾句極短簡的批評，這並不表示我對他們缺乏同情的理解和重視，這些批評，只表示我對他們的思想有了批評的興趣和批評的反應，我相信他們即使不接受我的批評，但至少會有寬容我的批評的雅量。

中國傳統的著述家有一個錯誤而不健全的態度：就是他們對於同時代的人的思想學術，不願有所批評陳述。他們以為評述同時代的人的著作，容易陷於標榜與詆毀——標榜那與我感情相得利害相同的人，詆毀那與我感情不洽利害相違的人。他們要等着同時代的人死去之後，然後再加評論，這叫做「蓋棺論定」。記得有一位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朋友，在他這書中對於那時尚活着的章太炎，一字不提，雖然他與章太炎並無私交，而那時章氏年已老邁，他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已相當確定。一直到他這書業已出版後，章太炎才逝世，於是他等着章氏逝世之後，方特別著一篇長文，講述章氏在中國學術上的貢獻。這種態度我認為是錯誤的，不健全的：第一，這種態度假定著述家評述時人只有標榜與詆毀兩途，沒有其他合理的持中平正的路途，如同情的了解，客觀的欣賞，善意的批評等等，這未免自貶著述家的人格。殊不知，評論時人，抱超然的無關利害的態度，雖較之評論古人為難，卻應勉力予以提倡鼓勵的。第二，堅執「蓋棺論定」之說，亦嫌失之狹隘偏執，因為，有許多人未蓋棺而論已定。又有許多人已蓋棺了千百年，而議論紛紛，猶不能定。若偏執「蓋棺論定」之說，誤認對於同時代的活着的人，社會上絕無確定的公論，根本否認「與



論「時論」的公正性，尤屬偏激。且評論之公不公，定不定，須視其評論之出發，是否基於理性，有無證據，不應以上理方面的死或活為標準。第三，這種不評述時人的著作的態度，大有妨害學術思想的進步，因為一個著作經人評述之後，可以多引起世人的注意，促進學術思想的自由交換流通。而著述者本人經過評述者的批評或鼓勵後，也可以使他加以改進和愈益努力。所以評述時人著作，實有鼓舞玉成，使學術空氣濃厚並進步的好處。尤其我們應了解著作家的心理，他的著作出版後，他不怕別人的批評或攻擊，他最怕的是他的著作如石沉大海，無人理會，所以評論時人的著作，不怕率直無忌，公開批評指斥，而最切戒的，是不寫成文字公開評論，而但於背後說長道短，私自發出些偏狹嫉刻，不負責任的詆毀。

我自信本書對於時人的哲學著作，搜羅相當的廣，我尤其要感謝北大哲學系講師石峻和任繼愈兩先生，供給了我不少的材料。但我們所未曾讀到的哲學著作，當然還是很多。即就我們所讀過的著作而論，我們在本篇中的評述，或亦不免有欠公允，不能令人滿意的地方。除表示歉意外，只有希望不久我們中國哲學界也可以採取英美德等國刊行「當代哲學家自述集」的辦法，各人自述各人的哲學思想，庶可彌補本書的遺憾了。記得張東蓀先生在抗戰前即曾提倡過編輯中國當代哲學家的自述集，希望在抗戰勝利後不久的將來，可以實現。

此外我還須表示一點歉意的，就是中國哲學界有一些人哲學造詣很深，境界很高，講授哲學，成績很好，但因他們平日不立語言文字，使我們無得而稱焉。此外還有許多非哲學界的人士，他們

對於哲學的興趣很濃，見解很高，有時以新穎有趣的思想 and 文筆，發揮為非專門性的著作，有時他們自己身體力行，發為事功。我們除於「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一章，會概括提到一點外，因限於體裁，殊以未能略加表揚為歉。又近年來有幾個大學哲學系的講師助教研究生，和哲學編譯機關的哲學編譯員，很有不少富於哲思和研究興趣的有希望的人才，我希望十年後，有人再寫「當代中國哲學」時，他們中有許多人都會佔很重要的地位。總之，須知本篇挂漏的地方甚多，讀者幸勿以本篇即代表中國當代哲學之全，或誤以中國當代哲學即盡於斯矣。

本書第一章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是應「五十年來的中國」一書的主編者潘公展先生之約而寫的，曾以「五十年來的哲學」為題，首先發表於該書之內。（二十四年五月，勝利出版社。）茲略加修改補充，列為本書的首篇。此篇實為刊行此冊的導端。蓋因此篇未能寫完，方承公展先生及印維廉先生的好意，提議並再三催促我寫完此文，另刊單行本的。第二章，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是特為刊行此單行本而寫的，沒有在別的地方發表過。第三章，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是三年前在青年夏令營的一個演講，由樊星南君的筆記整理而成的，曾在文化先鋒上發表過。篇中或不免有欠補充欠發揮，易引起誤會的話，但我實在沒有工夫重新再寫了。只好請讀者原諒。第四章，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足以代表中國現代哲學中討論得最多，對於革命和抗戰建國實際影響最大的一個問題。這篇文章指出知行問題，自王陽明以來，直到近十餘年，的確有了新的進展。發揮此

文最初曾分五篇發表於三民主義週刊。當時李惟果兄主持該刊，此五篇文字之寫成，應感謝惟果

兄函電催促之力，此五篇文字某書店曾印有單行本，但因未得我的允許，且錯字太多，紙張太壞，故特略加增刪，收在本書內，作爲第四章。就編排的體裁論，可當作附錄看，但就內容實質說，實本書中最關重要的一篇文字，望讀者特別留意。因爲我自己覺得這篇文字似乎對於關係中國現代哲學思想和時代思潮很大的知行問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第一明白指出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不惟不衝突，而且互相發明。第二，指出從知難行易說推釋出來的「能知必能行」和「不知亦能行」兩原則，較之知難行易說的本身尤爲重要，尤爲根本且較深於學理基礎，較便於指導生活，較能表現近代精神。第三，指出我們還可進一步肯定地說「由知難行易說到知行合一說」的邏輯發展，因爲「知難行易說應以知行合一說爲基礎，不然則理論不堅實；知難行易說應以知行合一說爲歸宿，不然則理論不透澈。」

附錄內所收浙江大學謝幼偉教授所撰「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一文，足以印證並補充此冊所評述者，係自文化先鋒第三卷第二十四期轉載過來，特此聲明，並感謝謝先生。

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於昆明。



# 當代中國哲學目次

序言	一
第一章 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	一
第二章 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	六
第三章 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	六六
第四章 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	八四
附錄 謝幼偉著 抗戰七年來之哲學	一四三



## 第一章 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

近五十年來，中國的哲學界即或沒有別的可說，但至少有一點可以稱道的好現象，就是人人都表現出一種熱烈的「求知欲」。這種求知欲也就是哲學所要求的「愛智之忱」。我們打開了文化的大門，讓西洋的文化思想的各方面湧進來。對於我們自己舊的文化，如果不是根本加以懷疑破壞的話，至少也得用新方法新觀點去加以批評的反省和解釋，也覺得有無限豐富的寶藏有待於我們的發掘。尤其足以迫逼着我們，使我們不得不努力探求新知的地方，就是我們處在一個嶄新的過渡時代，社會、政治、文化，思想信仰均起了空前急劇的變化。其劇變的程度，使許多激烈趨新的人，轉瞬便變成迂腐守舊的人，使許多今日之我，不斷與昨日之我作戰的人，但猶嫌趕不上時代的潮流。我們既不能墨守傳統的成法，也不能一味抄襲西洋的方式，迫得我們不得不自求新知，自用思想，日新不已，調整身心，以解答我們的問題，應付我們的危機。因此，這五十年來特別使得國人求知欲強烈的主因，是由於大家認為哲學的知識或思想，不是空疏虛幻的玄想，不是太平盛世上的點綴，不是博取科第的工具，不是個人智巧的賣弄，而是應付並調整個人以及民族生活上，文化上，精神上的危機和矛盾的利器。哲學的知識和思想因此便被認為是一種實際力量——一種改革生活，思想和文化上的實際力量。

所以，欲了解我們，近幾十年來的哲學思想，我們必須得特別注意：（一）推翻傳統權威和重興解釋哲學思想之處；（二）接受並融會西洋哲學思想之處；（三）應用哲學思想以改革社會政治之處。因此本書也分下列四章：（一）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二）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三）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判；（四）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茲先述第一章。

有許多純粹研究中國哲學的學者，他們沒有直接受過西洋哲學的訓練，然而他們卻感受到了西洋文化思想的震盪，而思調整並發揚中國哲學以應新時代的需要。他們的心理分析起來，大約有幾種不同：有的人對於中國的文教有了宗教的信仰，而認為西方的文化有了危機，想發揚中國文化以拯救西方人的苦惱。有的人，看見西洋思想澎湃於中國，中國文化有被推翻被拋棄的危險，抱孤臣孽子保持祖宗產業的苦心，亟思發揚中國哲學，以免為新潮流所沖洗，蕩然無存。有的人，表面上攻擊西洋思想，而不知不覺中卻反受西洋思想的影響。也有些人，表面上，虛懷接受西洋思想，然而因不明西洋思想的根柢，他所接受的乃非真正的西洋思想，而仍然回復到舊的窩臼。前一種人，他的思想中本來有新的成分，甚或從守舊眼光看來有些離經叛道的思想，而他仍說他是直接孔孟。後一種人，喜歡用他自己也不全懂得的新名詞新口號，喜歡作翻案文章，抬出些他們尚未鎔化的西洋某派學說或主義來攻擊古人，然而細考其思想言論，他並未能將中國哲學向前推進一步。

大體上講來，中國哲學在近五十年來是有了進步。這進步的來源，可以說是由於西學的刺激，



清末革新運動的勃興，和從佛學的新研究裏得到方法的訓練，和思想識度的提高與加深。我們試簡單地結算一下，至少有了下列幾點，可以值得我們大書特書：（一）在這幾十年中陸王之學，得了盛大的發揚；（二）儒佛的對立，得了新的調解；（三）理學中程、朱、陸、王兩派的對立，也得了新的調解；（四）對於中國哲學史有了新的整理。

要敘述最近五十年來從舊傳統裏發展出來的哲學思想，似乎不能不從康有爲（一八五八至一九二七）開始。康氏於五十年前（一八九一）開始講學於廣州長興里之萬木草堂。以一派宗師，思想政治禮教之大改革家自命。綜他生平的思想，雖經過激變，由極激烈之改革家，變爲極頑固之守舊派。然他生平用力較多，氣味較合，前後比較一貫服膺的學派，仍是陸王之學。他在萬木草堂時，對於梁任公、陳千秋作學的方針，仍「教以陸、王心學」（見梁任公三十自述）。平時著書立說，大都本「六經註我」的精神，撫拾經文以發揮他自己主觀的意見，他的新學偽經考一書，論者稱其爲「考證學中之陸、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洵屬切當。他大同書中許多膽大激越的理想，如燬滅家族，公妻共產，破除國界種界形界，類界級界，等等主張，也頗與王學末流猖狂的一派相接近。他晚年揭出「不忍」爲他所獨辦的刊物之名稱，所謂不忍亦與孟子惻隱之心，陽明良知之說較接近。

至於康氏的兩個大弟子，譚嗣同、梁任公，思想亦傾向陸、王。嗣同著仁學一書，他所謂仁，乃佛之慈悲，耶之博愛，陽明之良知的糅合體。他主張「衝決網羅」，特別注重打破名教禮教世俗的束縛，